

一 鸦片战争前的香港

香港地处中国南部边陲，位于广东省珠江口外，濒临南海，人称“东方之珠”。据 1997 年统计，全境面积约 1095 平方公里，人口 630 多万人，绝大多数为中国人。

从历史角度看，香港地区可分为香港岛、九龙和新界三部分。香港岛（包括邻近小岛）面积约 80 平方公里。九龙指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部分，包括昂船洲等小岛在内，面积约 47 平方公里。新界包括新界本土和离岛。新界本土指界限街以北、深圳河以南的大片土地，离岛包括大小 200 多个岛屿，其中较大的有大屿山岛（又称大濠岛）、青衣岛、南丫岛等。新界约占香港地区总平积的 88%。从鸦片战争开始，香港岛、九龙和新界逐步被英国强占和强租。

香港地区自古以来便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，中国政府很早即对这里进行有效的行

政管理。中华儿女世代在这里蕃衍生息。英国侵占之前，香港地区的农业、盐业、采珠业、制香业和文化教育事业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。早在南北朝和唐代，该地区的屯门已成为军事重镇和交通要冲。明清两代，香港地区在军事上地位更为重要，建立过比较系统的军事防御体系。英国占领以前的香港并非是荒凉的不毛之地。

1. 香港考古

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，许多热心考古事业的中外人士在香港进行过多次考古发掘。据 1980 年统计，香港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遗址已达 100 多个。大量出土文物和人类活动遗迹说明，人类在香港地区居住，大约已有 6000 年的历史。

香港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中期（距今约 5000~6000 年）遗址，分布在春坎湾、蟹地湾、细湾、大亚湾、铜鼓洲、大湾、深湾、东湾等地。遗址中打制石器和天然砾石工具占多数，磨制石器较少。陶器是绳纹粗陶和细泥软陶，后者饰有划纹、穿孔，有时施彩。1988~1989 年间，香港考古工作者在大屿山东湾发

现的遗址规模较大，遗物数量较多。有 50 多件石器，包括单边砍砸器、双边砍砸器、刮削器、石锤，砾石、石屑、石片和分割砾等。还有一个制造和使用石斧的大型工场，从中发现石斧胚、制造斧胚时打出的废片与斧胚再结合、未使用的石斧、使用过的石斧、使用中断的石斧、磨制石斧的大型砾石等。

香港新石器时代晚期（距今约 3000 ~ 4000 年）遗址，分布大湾、深湾、榕树湾、石壁、沙洲、铜鼓洲、大贵湾、小亚洲、芦须城、濠西等地。遗址中大量发现种类繁多的磨制石器，制作较佳，出现了有段、有肩的新型石器，这大约与装柄技术的进步有关。遗址中还发现用石英和其他石料制成的饰物，如大小不一的石环和石块等，制作比较精细。陶器以几何印纹陶为主，已有原始陶窑，烧成温度提高到摄氏 1000℃ 以上。

香港青铜时代大约开始于公元前 1500 年，遗址分布在大湾、石壁、深湾、万角咀、南丫岛北段小学、大浪湾、怡朗（二浪）、铜鼓洲、茅达湾、扫管笏、牛牯湾、牛坎沙、牛铃冲、春坎湾、蟹地湾等地。出土文物为兵器（斧、钺、匕首、戈、镞等），也有一些青铜工具（空釜斧、削、鱼钩等）。大屿山石壁东湾出土

的青铜器陶范，说明香港地区的青铜器有许多是本地制造的。这一时期的陶器，夹砂陶大为减少，泥质陶占主要地位。制陶使用陶轮。出现一种经过较高火候烧制而接近结晶的硬陶。纹饰中除了传统的绳纹、几何印纹外，出现一种外国学者称为“双 F 纹”的夔纹（夔龙纹），是这个时期特有的纹饰。

大量出土文物说明，香港地区和广东的古文化具有极其密切的联系，同属一个文化系统。从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文物看，香港大湾、蟹地湾、铜鼓洲等地发现的彩陶，与 1961 年以来在增城金兰寺，东莞万福庵，深圳大、小梅沙，以及 1949 年在海丰沙坑发现的彩陶相似。一是器形多数是圈足盘和碗（钵）；二是花纹图案基本是几何图案。此外，香港遗址出土的有肩石斧、有段石□，从造型到制作，甚至有些石料（霏细岩），都和广东特别是西樵山石器制作场的产品很相像。再者，香港大湾、深湾、石壁、东湾等遗址出土的刻划纹、绳纹的粗砂陶器，以及年代较晚的几何印纹软陶器，和深圳大小梅沙、鹤地山、赤湾、宝安蚌地山，增城金兰寺，佛山河宕，南海灶岗，高要茅岗及珠海拱北等遗址和墓葬出土的文物极其相似，从青铜时代遗址出土文

物看，香港的青铜器与广东的一样，特点之一是武器多，礼器、容器少。大湾出土的一件人面纹匕首，和清远三坑东周墓、曲江石峡遗址上层的几乎一模一样，这个时期香港的夔纹、云雷纹陶器（相当于春秋或稍早）和米字纹陶器（相当于战国时期），在广东已见于两百处以上的遗址和五六十座墓葬。在广西、福建、湖南等省也有发现。

中国东南沿海在古代曾经是百越部族生活的区域。古代学者臣瓚对《汉书·地理志》所做注释说：“自交阯至会稽七八十里，百越杂处，各有种姓……”香港地区与广东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文化具有同一性，是因为在这些地区居住生活的都是百越人。

在香港地区还发现了 8 处岩画，分布在石壁、蒲台岛、东龙洲、大浪湾、长洲、大庙湾、濠西和清水湾。其图案大致可分为两类，一类为本雷纹、圆圈纹，另一类为鸟、蛇、夔龙、怪兽等动物形象。这些图案类似中国青铜时代铜器和陶器上的某些纹饰，由此推断其年代为春秋战国时期。这些岩画大都位于临海的岩石上，面向海湾，前面有比较平坦宽阔的空地。据推测是百越人所刻，可能与他们举行某种祀神仪式有关。

1955年8月，在九龙深水埗的李郑屋村发现古墓一座，成为轰动整个香港地区的一件大事。香港大学林仰山教授（Prof. F. S. Drake）率领师生员工进行发掘，获陶器61件、铜器8件和许多有文字或图案花纹的墓砖。李郑屋村古墓墓室呈十字形，墓顶为穹窿形状，甚圆整坚实，与1921年在广州东郊驷马冈发现的汉墓，形制相同，只是规模稍小。这种十字形穹窿状屋的墓形盛行于广东地区，是在东汉中期。古墓出土的陶器，有陶罐、陶尊、陶壶、陶盂、陶碗、陶勺、陶豆、陶奩、陶缶、陶屋、陶仓等，皆与内地汉墓中发掘出之陶器相仿。其陶勺、陶鼎，陶尊，尤与广州东山羊山横路汉墓所出陶勺、陶鼎相似。该墓出土铜器虽少，但同样具有重要意义。例如铜铎一个，较1945年广州市郊出土的一件稍小，但同为汉代遗物，亦同为受吴越影响而成。这种较铜钟细小的乐器，曾盛行于吴越旧地。另外，出土铜镜上的鸟首纹样，与广州东山羊山横路汉墓出土铜镜的纹样相似，其为汉代遗物亦无疑问，该墓墓砖上有的有“番禺大治历”、“大吉番禺”等字样，字体为隶书略带篆笔。有的墓砖有动物形或几何图案形花纹，其墓砖字体与图案花纹与中国内地汉墓的字体和花纹

极为相似。“大治历”为汉代各地通行之吉语。

“番禺”二字指明所葬地区归番禺管辖，番禺为秦汉时代南海郡的一个县，也是郡治所在地，其地在今天的广州。墓砖上写“番禺”，而不写“宝安”、“东莞”或“新安”，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。综合上述种种情况，学者们比较一致地断定这座古墓建造于东汉中期。该墓的发掘有力地说明香港地区与广东的文化具有同一性，并且都越来越强烈地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。

2. 历史沿革

香港地区在秦、汉、三国及东晋初年共 500 多年的时间内，属番禺县管辖。秦始皇三十三年（公元前 214），秦平定南越，在岭南设置南海、桂林、象郡等 3 郡。南海郡下辖番禺等 4 县。香港地区与番禺治地相连，应属番禺管辖。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东晋初年。李郑屋村汉墓墓砖上有“番禺大治历”、“大吉番禺”等铭文，就是该地区在汉代属番禺管辖的明证。

东晋咸和六年（331）至唐朝至德元年（756）400 多年的时间内，香港地区属宝安县

管辖。咸和六年东晋成帝将南海郡东南部划出，新置东官郡，下辖宝安等 6 个县。东官郡治与宝安县治皆设在滨海重镇南头，与香港地区紧相毗连。后来，南朝梁武帝改东官郡为东莞郡，隋文帝时撤销东莞郡，并入南海郡，到唐代又取消郡一级行政机构，但宝安县的建置长期未变。

唐肃宗至德二年（757）改宝安县为东莞县，县治由南头迁往到涌，即今日东莞县治。此后，经历五代、宋、元，至明朝隆庆六年（1572）前后 800 多年的时间内，香港地区一直属东莞县管辖。

从明朝万历元年（1573）起，到清朝道光二十一年（1841）英国开始逐步侵占香港地区为止，该地区一直属广州府新安县管辖。明朝嘉靖年间，南头一带发生饥民抢米暴动，乡绅吴祚曾参与平息暴动。事过之后，吴祚等向广东海道副使刘稳请求在当地建县。众多官绅皆认为当地离东莞县治百余里，管理不便，又常受“海寇”骚扰，纷纷附议。刘稳转详粤督，奏准设立。万历元年从东莞县划出 56 里、7608 户、33971 人，成立新安县。县治仍设在南头，即东官郡治与宝安县治旧址。元朝初年，元朝政府曾在该地区设置屯门巡检司，额

设巡检一员，辖管寨兵 150 人，衙署位于屯门寨。后又在该地区设置官富巡检司。巡检司是县以下的一级行政单位，巡检司的设置标志着中央政权对该地区管理的加强。

洪武三年（1370）明朝政府亦在该地区设置官富巡检司。担任官富巡检司巡检有姓名可考者，最早的是福建人林云龙，万历二年到任。官富巡检司署设在九龙半岛的官富寨（今九龙城附近），大约在清朝初年，衙署年久失修，莅任者多借深圳附近赤尾村民居办公。康熙十年（1671）巡检蒋振元捐献薪俸购买赤尾村民地，起造衙宇，将驻地正式迁往该地。从嘉庆年间王崇熙等修纂的《新安县志》卷二《舆地略》记载的情况看，官富巡检司管辖的土客籍村庄，大都分布在今天的香港岛、九龙和新界，仅福田、赤尾、小梅沙等少数村庄，分布在今深圳特区内。可见官富巡检司的管辖范围，与现在的香港地区大体相当。

香港地区多优良的海湾，很早就是中国南方海上交通要冲。新界的屯门在古代曾是该地区的重要港口，南北朝时期，梁简文帝大宝元年（550）春，曾“于宝安县设屯门镇，以重兵守之”。唐代广州对外贸易十分繁忙。当时屯门是广州海外交通的外港，是海船进出广州

的必经之地。《新唐书》曾引用唐朝地理学家贾耽撰《古今郡县道四夷述》“广州通海夷道”条说：“广州东南海行，二百里至屯门山。”商船众多，地位重要，唐朝亦在此设置屯门镇，派兵驻守。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“南海郡”条写道：“有府二：曰绥南、番禺；有经略军，屯门镇兵。”唐朝一些著名文学家的作品中出现过描写屯门的诗句。韩愈在《赠别元十八协律》诗之六中写道：“屯门云虽高，亦映波涛没。”刘禹锡在《踏浪歌》中写道：“屯门积日无回飙，沧波不归成踏潮。”目前尚无史料证实韩、刘两位到过屯门。屯门的景色出现在他们的诗作中，说明由于海上交通便利，该地在唐朝已经遐迩闻名了。

3. 经济开发

香港地区位于南海海域。南海中中国的西沙群岛等由珊瑚礁构成，有利于贝类繁衍，产蚌丰富。因海潮向北涌流，海蚌随之北移，使香港地区至广东合浦一带沿海成为蚌类聚集之地。广东人称此类海蚌为螺。螺中年代长久者，内壁往往育有珍珠，其珠圆润光泽，深受仕女喜爱，香港地区采珠业肇端很早。五代南

汉的几个君主都嗜爱珍宝，经常派人采珠。后主刘𦨭于大宝六年（963），在合浦的海门镇和东莞的大步海，招募采珠士兵数千人，设媚川都，专门从事泅水采珠。都为军翼之意。媚川都为驻军之一类。《宋会要》曾经这样记述媚川都采珠的情况：“（采珠士兵）皆令以石砸足，蹲身入海，沉水而下，有至五百尺深者。咽溺而死者，无日不有。”虽然采珠工作艰辛危险，但因采珠士兵人数众多，采撷的珍珠很快就充盈内府。后主的殿宇内，栋梁帘箔都用玳瑁珠翠装饰，华丽异常。南汉设媚川都的大步海，即今天香港地区新界的大埔海，由宋、元至明，在这一海域，时而明令官采，时而下诏禁采，到康熙初年才永禁官采。

宋代在古代香港经济开发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。这个时期该地区的制盐业、航海业十分发达，内地向这里的移民活动也颇具规模。

香港地区海岸线漫长，沿海许多地方是适于产盐的潮墩、草荡，自古为产盐地区。汉武帝推行盐铁官营政策，曾在番禺设置盐官，驻地在与该地区紧相连接的南头，该地区当时为产盐之地，似无疑问。宋代曾在该地区九龙湾西北、今九龙城一带，设立官富场，派遣盐官，驻扎士兵，管理这一盐场。《宋会要》记

载说：隆兴元年（1163）“提举广东盐茶司言：广州博劳场、官富场，潮州惠来场，南恩州海陵场，各系僻远……欲将四场废罢，拨附邻近盐场所管内……官富场拨附叠福场……从之”。隆兴为南宋孝宗年号。从这段史料看，官富场的设置年代当在孝宗以前，至迟在宋高宗时。1955年，香港一名建筑师在当地北佛堂天后庙庙后，发现宋代盐官严益彰摩崖题记：“古汴严益彰，官是场。同三山何天觉，来游两山……咸淳甲戌六月十五日。”咸淳甲戌为南宋咸淳十年，即公元1274年。“官是场”之“场”，因刻石地点与官富场相连，似应为官富场。如果这一判断正确，则可认为官富场在一度并入叠福场后，又曾恢复其建制。但无论这个“场”是指“官富场”，还是“叠福场”，宋代该地区制盐业比较发达，设有盐官专司其事，则是毫无疑义的。

大屿山，古名大奚山，是香港地区最大的岛屿，开发较早，居民以捕鱼、制盐为生。宋高宗时曾招降当地来佑等人，选其少壮者为水军，宽其渔盐之禁，称之为腌造盐。宋宁宗时，广东提举盐茶徐安国派人前往大屿山缉捕私盐贩子，引起岛上大规模的盐民起义，以高登为首的起义者一度乘涨潮攻到广州城下。

宋代香港地区九龙半岛的航海业已经比较发达。据九龙蒲冈村《林氏族谱》记载，宋时福建莆田一个名叫林长胜的，举家迁往今日新九龙黄大仙附近的彭蒲围（即今日的大磡村）。一连几代靠行船为生，艚船往来于闽、浙、粤等地。一次，他的孙子林松坚、林柏坚驾驶艚船出海遇到飓风，船毁货失。他们两人力挽船篷，紧抱船上祀祭的林氏大姑神主，浮到东龙岛（南佛堂），安全脱险。他们认为这是神灵保佑，便在南佛堂修建了祭祀林氏大姑的神庙。林松坚的儿子林道义后来又在北佛堂修建了一座同类神庙。这个林氏大姑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天后。宋代林氏家族的迁徙史和该地区南北佛堂天后庙的修建，曲折地反映出当时该地区航海业的发展。

很古的时候，就有来自祖国内地的移民和香港当地居民一起，共同开发这个地区。有文字可考的最早的移民活动始于东晋。东晋末年，卢循领导的浙东起义军曾经攻陷广州城。起义失败以后，余部多退至今大屿山一带。唐代刘恂《岭表录异》写道：“卢亭者，卢循前据广州既败，余党奔入海岛野居，惟食蚝砺，叠壳为墙壁。”这里没有明确指出避难海岛的名称。清代东莞邓淳在《岭南丛述》“卢亭”

条则写道：“大奚山三十六屿，在莞邑海中，水边岩穴，多居蛋蛮种类。或传系晋卢循遗种，今名卢亭，亦曰卢余。”

此后规模较大的移民活动发生在宋朝。宋神宗时，进士邓符协（江西吉水人）在赴广东阳春任县令的途中，曾由海道经过今日新界的屯门，对当地风土之美十分欣赏。他在任满辞官之后，举家迁往岑田（锦田）。邓符协在此置田园、筑庐墓，从事农业开发。他修筑了锦田的南北围，还将其曾祖父母、祖父母和父母的遗骸迁葬新界。据传，到明朝万历年间，邓氏后裔邓元勋已成为拥有良田万亩的富户。到清初康熙年间，邓族不仅拥有锦田一带的富庶土地，在香港岛也拥有不少田地，成为首屈一指的望族。此外，北宋末年，进士侯五郎迁至东莞县，其子侯卓峰迁往今日河上乡筑茶寮，做小生意。其后人目前居住在新界的河上乡、燕岗、金钱、丙岗等地。宋代以后，廖、文、彭等族陆续迁入。他们与邓、侯两族，合称新界五大族。

新界各族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，还创设书院、学舍，传播中国文化。据统计，这类学校共有 25 所。其中历史最久远的是宋朝邓符协为聚众讲学，在桂角山下设立的力瀛书院。

其始创年代，比广东省内的著名书院广州禺山书院、番山书院等，还要早 100 多年。该书院遗址清初犹存。清朝时期，比较著名的则有锦田的周王二公书院、九龙城内的龙津义学等。上述情况说明，香港地区的部分居民很早就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。

香港地区山岭与坡地的许多地方，土质适于种植香木。当地在明朝盛产香木。这种香木属于莞香，又名女儿香，当年在广东与江浙等地备受欢迎。每当中秋佳节，运存在苏州府城的莞香，往往一个晚上就销售一空。王崇熙纂《新安县志》卷二《輿地略·物产》曾提及香港地区往昔出产香木的景况：“香树，邑内多植之。东路出于沥源、沙螺湾等处为佳。”沥源即今日新界的沙田等地，沙螺湾则在大屿山西部。今日沙田白田村附近尚有名为香粉寮的地方。清朝康熙元年至二十三年（1662~1684），清政府企图断绝闽粤沿海人民与郑成功的联系，实行沿海迁界 30 里以至 50 里的政策。香港地区的人民也被迫内迁，造成当地香业的凋衰。到雍正年间，在东莞又出了个因承旨购求异香杖杀里役的县令，种香人家纷纷忍痛砍树，四出逃亡。从此香木生产一蹶不振。

4. 海防要地

明清时代香港地区成为海防要地。明代在这里设防，是为了防御“倭寇”、葡萄牙和荷兰侵略者。清代在这里设防，先是为了对付郑成功和沿海海盗，后来则主要是为了防御英国侵略者。

洪武十年（1377），明朝政府在东莞县治南设置南海卫，洪武二十七年（1394），又设置东莞守御千户所和大鹏守御千户所，并隶南海卫。香港地区应是这两个千户所的防御范围。就在洪武二十七年，明朝政府命令吴杰、张金宝等率领武官，前往广东“训练沿海卫所官军，以备倭寇”。当时在广东设有备倭巡视海道副使一人、都指挥一人、卫指挥一人，“专管巡海”。至明朝中叶，广东沿海有三路巡海备倭官军，其中的中路“自东莞县南头城，出佛堂门、十字门，冷水角诸海澳”。佛堂门在香港地区，该地区显然属于中路的防御范围。

嘉靖四十二年（1563），福建巡抚谭纶、总兵戚继光奏请恢复设置水寨旧制，“每寨设福哨，乌桨、号船四十只，屯大洋贼船必经之

处，其余各寨附近紧要港澳则分哨以防内侵”。在此之后，明朝政府在广东的潮州、惠州、广州、高肇、雷州、琼州等地设置了水师六寨，在广州地区的为南头寨，防御地区东至大星，西至广海。从嘉靖四十四年（1565）起，南头寨的军事首长是一名参将，万历十四年至十八年（1586~1590）一度改为由级别更高的总兵担任。南头寨旧额大小战船 53 艘，官兵 1486 人；万历十九年（1591）以后，战船曾增至 112 艘，水陆官兵及杂役曾达到 2008 人。该水寨辖有佛堂门、龙船湾、洛格、大澳、浪淘湾、浪白等汛地 6 处。每处汛地驻军 200 余名。其中至少有佛堂门、大澳两处汛地属于今天的香港地区。

从明朝正德九年（1514）起，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曾经侵占香港地区的屯门达 7 年之久。他们在当地立石柱，刻葡萄牙国徽于其上，以示占领。他们还建军营、造火铳、设刑场、劫掠财物、贩卖人口，激起广大中国人民的愤恨。广东巡海道副使汪鋐亲自出征，驱逐葡萄牙侵略者。起初葡萄牙人据险顽抗，以佛朗机铳轰击明军，并企图占据南头城。汪鋐亲临前线，指授方略，用破旧的船多载枯柴和干燥的荻草，灌以油脂，因风纵火。葡船大，不易